

● 陈谦 著

中国古代 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

● 陈谦 著

政治传播思想研究

——以监察、谏议与教化为中心——



本项目得到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以监察、谏议与教化为中心 / 陈谦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
ISBN 978 - 7 - 5004 - 7980 - 2

I. 中… II. 陈… III. 政治 - 传播学 - 中国 - 古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1829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修广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泛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与政治传播思想	(27)
第一节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	(28)
一、信息中枢的决策制度	(29)
二、政治信息的传递渠道（包括媒介）制度	(30)
三、政治信息的收集与反馈制度	(30)
四、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传播权力调节制度	(31)
五、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	(32)
第二节 先秦儒家的政治传播思想	(33)
一、“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重视政治传播中枢的道德素质，有将政治传播 等同于道德传播的倾向	(34)
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传播活动中“礼”的原则	(37)
三、重视教化传播在政治中的功用	(41)
四、重视民意 ——初步的舆论思想	(44)
第三节 先秦法家的政治传播思想	(46)
一、强烈支持政治传播的一元化	(46)
二、“以法为教” ——政、教几近完全合一的传播主张	(48)
三、以权术驾驭臣下的信息监控思想	(50)
四、先秦法家行政管理思想的组织传播学分析	(51)
第四节 墨家与道家的政治传播观	(57)
一、“一同天下之义” ——墨家的政治传播观	(57)

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家的政治传播取消观·····	(60)
第五节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基本特征·····	(61)
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政治倾向·····	(62)
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学意义·····	(66)
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与君主专制的政治思维·····	(67)
第二章 面向臣民的信息监督控制思想	
——以监察为中心的传播观·····	(73)
第一节 信息传播是中国古代监察活动的重要特征·····	(74)
一、传播者·····	(76)
二、传播内容·····	(77)
三、传播渠道（媒介）·····	(77)
四、受传者·····	(77)
五、传播效果·····	(77)
第二节 古代政治信息监控思想的发端·····	(78)
第三节 先秦的政治信息监控思想·····	(83)
一、“人主以一国目视”，“以一国耳听”	
——信息监控的理想状态（或目的）·····	(84)
二、“定分”	
——信息监控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85)
三、“潜御群臣”	
——信息监控中的“术”·····	(86)
四、几个有意义的信息监控原则·····	(88)
五、先秦法家信息监控思想的理论基础·····	(93)
第四节 耳目之寄：中国古代信息监控的关键性认识·····	(95)
一、身体政治与耳目之喻·····	(95)
二、“耳目”与监察职守的重要性·····	(98)
第五节 耳目思想与信息监控的原则、策略·····	(104)
一、以卑察尊	
——信息监控者的位势策略·····	(104)
二、重察贵要	
——纠举监控讲求重点的策略·····	(110)

三、风闻言事	
——快速奏报, 网罗天下信息的策略	(113)
四、秘密侦伺	
——暗布耳目的监控策略	(118)
第六节 小结: 从“监视环境”的传播功能看信息监控思想	(124)
第三章 面向君主的信息调节控制思想	
——以谏议为中心的传播观	(129)
第一节 信息调控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	(131)
一、谏议及谏议思想的起源	(131)
二、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政治理性思潮与谏议思想的发展	(132)
三、谏议传播的理论依据	(135)
第二节 先秦诸子的谏议传播思想概述	(138)
一、孔子: “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	(138)
二、孟子: “长君之恶, 其罪小, 逢君之恶, 其罪大”	(139)
三、荀子: “从道不从君”, 但“事圣君者, 有听从 无谏争”	(140)
四、韩非子: “凡说之难, 在知所说之心”	(142)
五、先秦法家与儒家谏议传播论的区别	(144)
第三节 谏议传播的分类思想及推崇“讽谏”、“曲谏” 的原因	(147)
第四节 几个重要的谏议说服原则	(151)
一、进谏时要揣度君主心理、情绪, 取得信任, 毋犯忌讳 ——说服的心理原则	(152)
二、进谏的语言与态度要适度, 不可作“迂险之言”、“激 切之论” ——说服的态度原则	(154)
三、不可扬君之过, 要尽力控制传播范围 ——信息的保密原则	(157)
四、规谏君主过失, 要防微杜渐, “必谏其渐” ——说服的时机原则	(160)
第五节 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谏议传播论	(163)
一、贾山: “人主之威, 非特雷霆; 势重, 非特万钧”	(163)
二、王符: “明君莅众, 务下言以招外, 敬纳卑贱 以诱贤”	(164)

三、陆贽：“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 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	(165)
四、白居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167)
五、苏洵：“勇者无不谏”，“勇怯半者，赏而后谏”， “怯者，刑而后谏”	(169)
六、范祖禹：“谏而被杀者，亡之兆也”	(171)
第六节 对君主纳谏的思考	(172)
第七节 小结：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信息调控思想	(177)
第四章 面向民众的信息规范控制思想	
——以教化为中心的传播观	(184)
第一节 教育、教化与政治	(185)
一、教育的概念	(185)
二、重教化	
——古代教育的重要特征	(187)
三、教化与政治	(188)
第二节 礼乐：教化内容的传播形式与媒介	(191)
一、“制礼作乐”	(192)
二、古代的礼乐传播活动	(194)
三、礼乐的政治伦理意义	(195)
第三节 典籍：后来居上的教化传播媒介	(198)
第四节 中国古代重要的教化传播思想	(203)
一、人性与教化	
——教化传播发生的思想起点	(203)
二、强调教化中的表率作用	
——教化传播者中心论	(207)
三、先富后教	
——教化传播的条件论	(214)
四、移风易俗，潜移默化	
——教化传播的渐进论	(220)
五、“草上之风必偃”	
——教化传播强效果论	(224)
第五节 小结：从传播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	(226)
结语	(233)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2)

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与该选题相关的想法可以说由来已久。笔者原来所学为图书馆学、历史文献学，但阴差阳错加上自身的爱好，于十余年前投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迄今发表了数十篇属新闻传播学的文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研究的局限性暴露出来，使学术水平难以提升。笔者不安于现状，渴望在学术上有所提高，一直在探寻治学的新路，所幸史学上的一些浅见对我有所帮助。于是，渐渐开始考虑如何将传播学视角与中国历史文化作有机结合。

2003年，笔者有幸考取南开大学，攻读专门史专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方向）博士学位。这样，之前的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应该说，十余年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研究，以及新闻传播学界学者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与文化传播史的若干研究成果的阅读积累，是开展研究的基础。在多年传播学教学与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感传播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一个研究问题的框架，相当广泛的领域都可以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因为人类的行为与传播不可须臾分离，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传播，人类的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通过博士在读期间的阅读与思考，笔者选择“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笔者深信，传播学虽创立于西方，但中国古人在传播实践基础上的传播观念及思想并不逊色，甚至更为深厚。粗略地说，政治传播思想广泛地蕴涵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论说之中，比如在中央决策、监察谏议、教育教化、编辑出版等与信息传播有关的活动中，必然产生一些主张、见解、观念等，它们应该是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可以纳入传播学的视阈当中进行建构与阐发，使之呈现出新的景观，并为传播学的实际运用提供范例。正如新闻传播学者李彬所言：“由于传播学的引入，学术观念发生飞跃，从而使许多以前颇显逼仄的论题一下子变得丰富多样，意韵深广。”^① 笔者认为，用传播学视角研究中

①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国古代政治思想，必然会拓新研究领域，开阔学术视野。

二、选题的价值

本选题的首要意义在于它基本上是新课题。虽然以往新闻传播学界对此有所涉及，但并不系统，且多将研究的视野局限于古代的新闻传播及“古代报刊”等传播媒介问题，并没有将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众多传播现象与行为纳入整个古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视野中，更少有对传播及政治传播思想的探讨。笔者以为，“传播”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广，研究可以不限于新闻传播。本选题则以广义“传播”概念（详见后论）作为认识的起点，以古代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为背景，从中钩稽梳理出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诸多要义，对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重要内容作出清理总结，乍看近似于传播史，但与一般传播史又有明显区别。

其次，它可以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将不少以往司空见惯的古代政治史、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进行传播学视角的转换，从而生发新意。而且，以往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大都是侧重政治哲学、政治理念及重大政治政策与主张，很少注意微观政治制度及政治活动中的观念与主张。可以说，中国古代王朝的决策思想、监察思想、谏议思想、教化思想、编辑出版思想等虽多属政治思想的范畴，但往往不受重视。本选题则力图在这些微观的政治思想方面有所挖掘、清理，并以传播学视角将其进行整合，从而丰富与深化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再次，通过研究，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及众多言政者在政治传播思想方面的建树虽称不上系统，却相当丰富，体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独特认识与思考。传播学虽创立于西方，但中国古人有着更为丰富、深入的传播实践与思考，而这些早已被西方传播学人所关注。1977年，被称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美国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传播的文化遗产，他指出：“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进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

^① “communication”一词被港、台地区一些学者译为“传”，现在多数学者将其译为“传播”，并且已成为稳定的译法。

能推陈出新。”^①因而，本选题也意在唤起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经验与思想研究的注意和兴趣。这是本选题的另一个意义。

又次，据实而论，中国港台地区引入传播学早于中国大陆，而且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开展较早。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余也鲁、台湾政治大学的徐佳士等人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香港与台北分别举行了为时一周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的传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研讨会。此后在香港，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研究领域有了一定进展，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②中国大陆引入传播学虽晚于港台地区，但发展势头很快。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会议提出了引入西方传播学的对策，即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③其中的“自主创造”就涉及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以后全国传播学界曾多次开会专门讨论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1993年，在海峡两岸及香港传播学学者的努力下，厦门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传播学中国化”成为重要议题，并商讨出十数个分支研究课题。^④“政治传播”研究也是其中的分支课题。经过不断探索，近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被冠以“华夏传播研究”之名。传播学者黄星民专门撰文界定所谓“华夏传播研究”的概念，以取代“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等提法。他将“华夏传播研究”界定为“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⑤其中对“传播观念的发掘、整理”就与笔者的选题相关。可以说，本选题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这种传播研究的趋势。另外，我国传播学者还对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的前景作出展望，比如张国良认为，中国人虽没有创造出传播学，但“中国人既有丰富的‘传播实践’史，又有同样丰富的‘传播研究’史”，“继承这一珍贵遗产，对其进行认真总结并使之上升至科学理论高度，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并认为这是“通往‘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他将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分为三个逐级递进的层次：“第一，以中国的传播实际为材料；第二，能切实为中国的传播事业服务；第三，能创造出新颖、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构架，从而为世界传播学的理论

① [美] 宣伟伯（施拉姆）：《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香港）海天书楼1983年版，第X—XI页。

② 参见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李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中国记者》1988年第6期。

④ 参见郑学檬：《华夏传播研究丛书总序》，《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⑤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刍议》，《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宝库增添新的财富。”^① 他的这一认识不但使笔者增强了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回答了本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中国台湾学者早在二十多年前已有“政治传播学”专著问世^②，大陆学者出版的第一部“政治传播学”著作已有十数年历史^③。这些都标志着政治传播学在中国初步建立，而且近些年来业已成为传播研究的新分支。但一门学科要想建立起较为严密的体系，主要依靠“论”（理论）、“史”（学术史、思想史与实践史）和“法”（方法）三方面的建构。相比较而言，很多学科的形成往往始于对“史”的研究，比如新闻学、广告学等就是如此。^④ 因此笔者以为，欲使政治传播学更加成熟、壮大，对政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容忽视。可以说，本选题同时也是在为政治传播学的建设添砖加瓦。

以上种种，均可说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这一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三、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以笔者所见，目前尚未发现以“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为题的系统研究成果，因此，比较恰当地说，它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题目。不过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否定或回避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最重要的相关性研究成果当属台湾学者的贡献。台湾的新闻传播研究者较早接触到西方传播学理论，同时台湾学者的传统文化观念相对较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他们较早采用西方传播学的观念来探索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播实践与思想。较早（1966年）的成果有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⑤。从题目上看，该书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在第一章“总论”中，曾先生提出对新闻史“研究范围的新认识”，即不再单纯以报纸的产生为限，而是以传播的大视野来考察新闻史。^⑥ 这一认识在该书第二章有所体

①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② 祝基滢：《政治传播学》，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 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据认为，西方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是德国学者普尔兹于1845年完成的《德国新闻事业史》（参见徐魁耀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是1925年由戈公振撰写的《中国报学史》。广告学的开端也是如此，据说最早将广告作为研究题目的著作是1866年J. 劳德和C. 哈特编著的《路牌广告史》，稍后的1874年，H. 辛普森编著了《广告的历史》（参见倪宁编著：《广告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从中大致可以说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存在一些相似的规律。

⑤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版。

⑥ 同上书，第1—4页。

现,即通过对民意发展的历史考察来说明报纸的功用及地位,认为这是“新闻史内容的扩大”^①。虽然就具体内容而言,它对本选题的参考价值不大,但还是具有思路上的启发性。另一位学者朱传誉于1967年出版了一部新闻断代史专著《宋代新闻史》^②,在学界获得较高声誉。朱先生长期从事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有较丰厚的史学素养,书中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该著作名为“新闻史”,实际上更像一部宋代政治传播史,比如书中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宋代朝廷的公文呈递制度、奏对制度、台谏制度、信息传播法令及出版法制等内容,不少材料与结论可资借鉴甚至沿用。朱先生视野开阔,已经转变了新闻史仅以研究新闻媒介为中心的取向,呈现给读者一个多视角的,以新闻传播为中心的传播(或者说是政治传播)断代史。新闻传播学者尹韵公在其《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前言”中,针对《宋代新闻史》的启发性,指出朱传誉的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传播学视角对“新闻史”的拓展。“传播学的崛起,使新闻学的研究摆脱了以往那种光是直勾勾地盯着报纸本身的源流和沿革,而忽视了对古代社会其他新闻传播现象给予必要关注的困境,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的视野,给新闻学研究灌注了新的强有力的活力。经过传播学的洗礼,新闻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③笔者在选题时,同样得益于这一研究范例的启发。另外,朱传誉还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先秦唐宋元明清传播事业论集》等著述值得参考。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于古代传播实践,对于传播思想却少有总结清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传播学者关绍箕的研究成果更值得关注。1994年,关先生出版了专著《中国传播理论》^④,其中借鉴了西方传播学思维,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建构了独特的研究范畴,将中国人的传播理论按照其所建构的范畴进行归纳总结,使该书既具有传播学特点,又不失中国特色。由于关先生长期阅读史籍,钩稽爬梳了相当丰厚的中国传播思想材料,终于在2000年出版了一部50万字的《中国传播思想史》^⑤。在这部著作中,关先生以自主建构的研究范畴为框架,以历史为序,采用列传式的方法较为系统地清理了百余历史人物和著作的传播思想。看得出来,关先生治学态度严谨,论述条理清晰、结构缜密、

①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29页。

② 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

③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前言》,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

⑤ 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版。

取材宏富。不过笔者以为,关先生的两部著作也存有缺憾,比如客观罗列多、征引多,自主论述和发挥较少,没有很好地进行总结与概括,而且较少联系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实际。而且与笔者的选题相比,关先生的成果只是一般性的传播思想史,对属于政治传播的思想和理论虽有涉及,但不够系统、全面。不过应该承认,笔者从关先生那里有所借鉴,比如他自主建构的研究范畴(框架)就颇有启发性。另外,由于征引广泛,使该书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近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界亦不甘人后,由传播学者金冠军、戴元光二人牵头,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2005年出版了近200万字、四卷本的《中国传播思想史》^①。该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传播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对促进中国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该成果同样属于一般传播思想研究,少有能够与本选题适切的论题。该成果的“古代卷”^②自称以“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③,但笔者所感受到的只是将多学科所涉及的传播问题罗列在一起,略显庞杂,缺乏明显的脉络,而且不少认识与结论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其中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对于政治传播思想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可以借鉴、参考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兹分类说明。

第一类成果是新闻传播事业通史。戈公振于1925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④被认为是我国新闻学(或报学)的开山之作。该书部分篇幅涉及古代新闻传播媒介、制度等内容,但当代新闻传播史学者方汉奇订正过其中的一些错谬之处。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通史成果,当属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⑤的“古代及近代”部分。这部分材料比较翔实,有不少可资参考与利用的内容。

第二类是新闻传播的断代史。这类成果以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⑥,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⑦为代表。这是在两位学者的新闻传播史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在国内新闻传播史界颇有影响,其中有不少与本选题相关的材料及结论可资参考。

第三类成果是以中国古人的传播实践与观念为对象,研究传统文化与传

① 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主编絮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⑤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播的通论、概说性的著作。这方面最早的成果当属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①。传播学者陈力丹对其有较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本书将中国的社会文化传播结构分为三个领域: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勾画出一幅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的立体图式。从远古到清末,从儒家到道法,读了令人感悟颇深。……这本书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正是它启发我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传播结构在孔子那里的雏形。”^②而且该书设有“政治领域的传播”一章,对政治传播制度与思想有初步的梳理和阐发,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惜该书议论较多,材料偏少且转引过多。近年来最有影响的成果则为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③。该书设有“政治传播”一章。由于该书系草创,且由十数位作者共同撰稿,稍显庞杂、芜蔓,主题及脉络不甚鲜明。其他成果如李敬一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论》^④、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⑤等也值得参考。

第四类成果或以一个专题为研究对象,如郭志坤的《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⑥、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⑦、倪延年的《中国古代报刊法制发展史》^⑧,或以摘引史料为主,如郑学檬的《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⑨。其中以郭、黄二位先生的著作与本选题相关性较高,有参考价值。

第五类是以近代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的新闻思想史并兼涉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成果,如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学说史》^⑩、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⑪等。从这些成果中可以了解与借鉴近代政治家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古代传播思想的继承关系。

还须说明,由于笔者的选题具有视角转换的特征,史学界前辈的不少政治制度史及政治制度研究及古代监察、谏议、教育、教化、出版等专题研究

①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② 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第1期。

③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 李敬一:《中国古代传播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⑥ 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 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⑧ 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法制发展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 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⑩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⑪ 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成果多可参考、借鉴。笔者的任务则是转换视角重新认识,并力图发掘、梳理、总结出一些富有新意的见解与结论。不过现有的这些成果总体上是对制度、活动研究多于对思想、主张的探讨。本选题虽涉及政治制度问题,但重点在于探索这些制度、活动中贯穿的思想主张,大致属于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而这恰恰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史学成果中的薄弱之处。当然,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研究成果,本选题亦有不少参考、征引之处。

可以说,以上列举的成果或多或少与本选题相关涉,它们无疑是本选题的重要参考。但由于集中、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的课题暂告阙如,因此,本书的研究框架和体系基本由笔者自主建构。

四、传播学与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可以断言,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传播学者甚至认为,人类基本行为除了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衣、食、住、行外,更应包括“传(播)”。^①正因为传播与人的行为如影随形,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也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对辩论、对话、说服等主题进行过探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同样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传播思想。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有意识地进行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

(一) 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一般认为,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有两个重要的源流,一是欧洲源流,二是美国源流。^②欧洲的传播学渊源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的理论。

更为直接的学术源流则来自美国的杜威(John Dewey)、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帕克(Robert Ezra Park)及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这些学者对于传播的某一问题的关注和初步研究,构成了日后传播学的基础。比如杜威认识到“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的重构”;库利提出了对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颇有影响的“初级群体”和“镜中我”等重要概念;米德关于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取得以及自我理论,对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具有很大影响。他提出的“主我”(I)和“客我”(Me)理论,对理解人内传播(或

①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称自我传播)的社会性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学者外,美国著名评论家和新闻工作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传播学的产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李普曼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拟态环境”,它阐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性”和大众传播对现代人行为的影响;一是“刻板成见”,它揭示了大众传播在形成“刻板成见”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然而,正如当代传播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传播研究都没有实现向传播学的转化,按照他们的认识,“传播研究”转化为“传播学”的标志是“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①这一转化直到20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才逐步实现。

(二) 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

尽管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思想渊源,而且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及传播对社会、政治等领域影响的加剧,各学科的学者纷纷进入传播研究领域,但毕竟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只是从各自的学科兴趣出发,附带地对传播现象作了初步的考察。施拉姆“把传播学研究比作学术领域的‘十字路口’和‘租界’,正是对上述情形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十字路口’说明许多人路过此地,路过传播学的研究领地,但很少有人在此逗留;‘租界’则是针对各家学术列强瓜分传播研究的状况而言”^②。而在此后,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可以说是在“十字路口”逗留的人,他们是: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卢因(Kurt Lewin)、霍夫兰(Carl Hovland)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他们在传播研究史上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

拉斯韦尔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倡始人之一,他在宣传研究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1927年,他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本书刺激了宣传研究,使之成为当时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他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结构与过程,将传播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著名的“5W”模式。“5W”模式既可以作为传播过程基本模式,同时也不自觉地勾勒出了传播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对形成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① [美]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总序》,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卢因的主要专业领域是群体动力学,他研究了不少群体传播问题,例如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制约等。他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达过程的研究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控制机制的重要理论。

霍夫兰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聘担任美国陆军心理实验室主任,研究的重点是宣传教育电影对提高士兵士气的效果。战后,他主持了“关于传播与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并把战时的研究成果整理为《大众传播实验》(1949)。1953年,他又出版了《传播与说服》。霍夫兰的学术旨趣在于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诸条件、传播方法和技巧的条件以及受传者本身的属性条件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并形成了说服力传播的研究流派。

拉扎斯菲尔德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担任负责人,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听众调研。1940年,他和卡兹等人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对总统大选中的宣传战进行了调查,以测定大众传播对选民态度的影响(史称“伊里调查”)。在这项研究中,他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左右人们态度的决定性力量,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它众多因素,如“政治既有倾向”的作用、受众对不同媒介或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机制、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等。根据这项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二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影响。这项研究对否定“枪弹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传统。

除了以上四大奠基人外,直接使传播研究登堂入室,“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则是施拉姆。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1956年又创办了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他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传播过程与效果》(1954)等。施拉姆一生撰写了近30部论著,具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有人将其冠以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名号。他的贡献在于“对许多与传播有关的学科和理论进行整理、提炼与综合,进而勾画出它的框架结构,充实其他的学说内容,使之具有独立学科的面貌”。施拉姆的学生坦卡德评论道:“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到完善。”^①

^①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